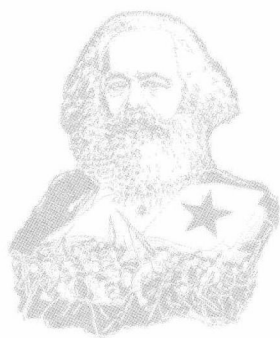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

*Marxism
and china*

上海人民出版社



*Marxism
and china.*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岳川夫,沈济时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08 - 09052 - 1

I. 马... II. ①岳...②沈...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494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封面设计 范昊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岳川夫 沈济时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20,000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052 - 1/A · 79

定价 39.00 元

前言

我们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学术集刊的形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与大家见面了。

读者们看到这本学术集刊,也许会认为此学术集刊的名称是否大了一些,而正因为“大”,她才有自身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博大精深,更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引。

纵观西方现代社会中各种理论学派和社会文化思潮,从其出现、传播都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思潮大部分会被人们遗忘,有的趋于衰落,有的甚至最后成为故纸堆而仅仅只是被学者们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如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心理学思潮、社会学思潮、历史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等。这是很多理论思想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命运。而马克思主义却摆脱了这一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理论学术界、社会政治界,无论是世界的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左翼势力还是右翼势力都在关注马克思主义、思考马克思主义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已被人们称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当前世界正处在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全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中,这一社会现实使马克思主义更成为世界的“热点”,人们再度掀起了对卡尔·马克思的兴趣。据有关材料报道,《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仅德国一个出版商在2008年就售出了上万册。从2008年10月开始,《资本论》重新进入了德国大学课堂。在包括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在内的31所高等学府里,课程长度为两个学期的《资本论》为人们提供了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视角。人们关注马克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事实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见,以至于英国学者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在他所著的恩格斯传——《衣冠楚楚的共产主义者: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一书中最后断言:恩格斯到了今天会再一次预言说,“马克思当年的高瞻远瞩得以实现了”。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无情而又是公正的。正确的东西总是正确的,

科学的理论并不会以人们的偏见、抛弃而失去自身的合理性与价值性。历史的发展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今的中国,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集体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此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将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是在高校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宣传和研究的工作者,或者说也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者。我们有责任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这一伟大的人类思想财富在社会意识与文化思想领域能够弘扬光大;我们有责任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这一伟大的人类思想财富与中国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世界人民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轨迹;我们有责任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这一伟大的人类思想财富在高校中成为大学生的理想追求、思想境界和观念创新之“道”。这就是我们创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一学术集刊的宗旨。愿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和研究的同仁们共同努力去承担我们的历史责任,也希望我们的同仁对本学术集刊多一点偏爱与支持,积极投稿。

岳川夫

2009年12月26日

目录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岳川夫: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003
- 沈济时:列宁对党政关系的探索及启示 / 015
- 赵庆寺:试论安全研究的理论视角 / 028
- 陈庆权:审美心理学学说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 / 041
- 李宏昀:《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图像理论”初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切入点 / 056
- 任颖龙:试比较共产主义与柏拉图之“理想国” / 069
- 张 妍:浅析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 078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

- 王建龙:论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双重紧张关系 / 085
- 万勇华:严复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探析 / 096
- 刘招成:从崇拜到鄙视:美国早期对中国看法的变化 / 104
- 易 欣:金融危机成因及应对策略——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 / 114
- 李 波:关于扩大内需复苏中国经济的思考 / 124
- 庞 鹂:在群体心理视角下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 136
- 许方园:中美暴力事件比较初论——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出发 / 144
- 虞金侃:群众路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152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法治建设

- 陈代波:开放与渗透:台湾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 / 165
- 胡克培:执法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论执法制度的伦理 / 174
- 刘正浩:关于法律伦理学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 185

张 秀:法律正当性研究起点的转换——从马克思的主体性到哈贝马斯的交互主体性 / 197

王 虹:论摩尔的“善是不可定义的” / 206

曹 婧:从隐私到可见——网络社会信息隐私权与曝光的伦理问题 / 211

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

徐家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学生主体性研究——兼论大学生的情感取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 / 223

何益忠:论作为“思政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特殊性 / 231

喻包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240

马 川:两类女生在异性交往中的差异比较以及机制分析 / 250

李 洁:学习型学校与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 262

周嘉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理论、现状与建议——基于对上海部分高校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现状的调查 /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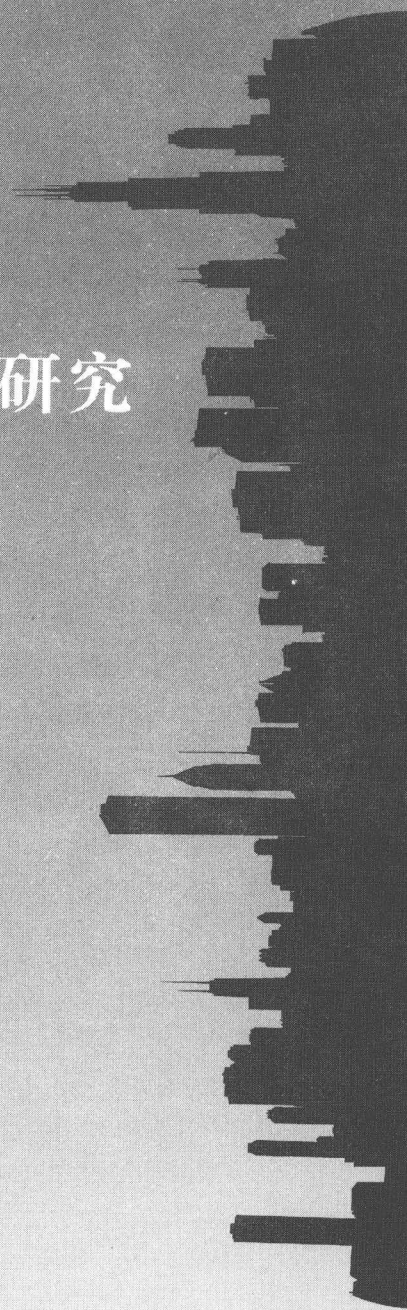
潘晓岑:论政法大学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归因及对策 / 279

2008年华东政法大学管理创新研究项目课题组 胡克培 刘正浩 朱 敏

马海涛 吴 玲:依法治校与创新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研究 / 29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维护 and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岳川夫

—

什么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理论和学术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与界定。有的学者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物质生产这一基本社会现实出发，从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探讨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内涵，去寻求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有的学者从道德发展和人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视角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应当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并强调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它的底线应当是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和人的基本尊严，使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而更多的学者寻求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方法，提出社会公平正义表现为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和公平消费，使所有人都能够在个人能力、贡献的基础上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

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解读社会公平正义，但其基本的内涵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与把握。公平的内涵是公正与平等。“公正”是指要有一套合理和科学的制度与机制来公正地对待一定范围内的各类人群或个人。这个一定范围，既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也可以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平等”是指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各类人群或个

^{*} 本论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一般课题“人本、公平与和谐”的成果。

人,均既有其作为公民或成员所应有的普遍的基本的权利与利益,也有与其身份、地位、能力和贡献等相称的权利与利益。公平不是平均、均等,公平承认人群和个人的差别,承认不同人群和个人在实际权利与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完全的平均、均等并不是公正,也不是公平。特别要指出的是,公平一词在英语里的主要对应词是 just、justice,平均、均等。平等的主要英语对应词是 equal、equality。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里,一般是讲平等与效率(equality/efficiency)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讲公平与效率(justice/efficiency)的关系问题。“公平的理念”即社会共同或普遍承认的有关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观。公平价值观,既来自全世界、全人类普遍承认的对公正与平等的共同要求,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关于公平的要求;也来自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对公正与平等的文化认同,如中国历史上形成关于大同社会的公平观念;还来自当代现实中普遍承认的对公正与平等的共同理念,如宪法关于公民的各项权利及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关于公平的理念或公平价值观,虽然因国家、阶级、阶层、人群、个人而有所不同,有些方面甚至是对立的;也因历史发展、时代更替而不同,产生着许多变化;但还是存在普遍公认或得到多数人认同的最基本的公平理念,正是这些最基本的公平理念维系着社会的生存、延续、稳定和发展。

二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诉求与公平正义理念的认识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原始社会而言,其时已有了某种原始的公平观。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十分低下,先民们只有靠群体的力量,协作互助才能维持生存,这就形成了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消费为特征的原始共产制度。相应地,公平观念也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萌生。在原始的生产关系中,由于劳动的重要性,先民们把参加劳动视为天经地义的公平。这种公平观在古埃及神话中得到折射:管理稼穡的俄赛里斯神即公平神专司对死人的审判,他以是否勤于稼穡来判断人们生前的罪恶。这样,公平就以劳动为依据,成为评判德行的最高准则。^①在分配关系中,原始社会成员之间实行的是

① 万斌、陈业欣:《公平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瓜分”或“酌量取用”的分配方式。

当有利益差别的阶级和阶层出现之后,公平观念具有了新的内涵。在西方从古希腊奴隶社会开始,思想家们便对公平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有关论述最具有代表性。苏格拉底讨论公平时常常与自制同时讲,因为,“对公平的破坏,来自人的无止境贪欲,或把脚伸到别人的领域中;而自制则意味着健康的灵魂、有序的内心,对人对神都会做正当的事”。^①柏拉图认为公平的要义在于:“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国家的正义在于各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当生意人、辅助人和护国者这些人在国家里各干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②亚里士多德对于公平这一概念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诠释。他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据。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在这方面,这种世俗之见恰好和我们在伦理学上作这种研究时所得的结论相同。”他还看到了公平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③亚里士多德主要是用“数量相等”和“比值(比例)相等”来诠释公平的内容。这是其公平说的主要特色。亚里士多德十分明确地指出:“公平就是比例,不公平就是违反了比例,出现了多少,这在各种活动中是经常碰到的。”^④他还说:“没有人不同意应该按照各自的价值分配才是公平。不过对所谓价值每个人的说法却各不相同。民主派说,自由才是价值;寡头派说,财富才是价值;而贵族派则说,出身高贵就是德性。”^⑤亚里士多德对于公平内容中数量平等和比例平等的解释,显示了其思想的巨大的历史超越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启示和借鉴,以合理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公平的具体规则和内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有关公平问题的见解,其理论依据同现代意义上的公平、平等、自由、正义理念相距甚远,因而他有关公平论述的具体内容同现代社会

① 参见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133、135、169、156页。

③④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149、234—235页。

也不可能是相吻合,相适应的。

西方社会到近代,思想家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关注公平问题,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公平研究成为可能。威廉·葛德文认为:“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公平地对待他,衡量这种对待的唯一标准是考虑受者的特性和施者的能力。所以,正义的原则,引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视同仁。’……正义是从一个有知觉的人和另一个有知觉的人的联系中产生的一种行为准则。……只要一离开正义的法则,虽然只是对于某些个人或者整体的某一部分施惠过多但这就等于从总的利益中减少了那么多,也就是说发生了那么多的绝对非正义。”^①与封建社会的解体,市场经济的出现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相适应,近代学者对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等学说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虽然就总体而言并没有从正面系统地考虑公平问题,但由于前述问题同公平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近代学者实际上将公平问题的探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西方社会发展到现当代,学者把公平问题研究全面地推进了一大步,使之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里的显学。在现当代的公平研究当中,分别以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最具代表性。罗尔斯是迄今为止研究公平问题最为深入、最为体系化的学者,其鸿篇巨作《正义论》一书代表了现今公平问题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罗尔斯认为,公平的基本准则(一般观念)应是:“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为了具体地解释上述基本准则,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具体的原则:第一原则是对最广泛的绝对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与一种相似的为所有人所拥有的一系列自由相适应),每个人就必须拥有一份平等的权利。第二原则是指社会不平等现象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必须调整,以使两者都:(1)对最无优势的人带来最大利益……而且(2)在机会公平的情况下,所有人能担任公务和领导职位。罗尔斯还假设了一种“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他认为无知才能公平。没有偏见就是无知,也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级,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的时候,他的决策就是毫无偏见的。当所有的人都在这样一种“无知之幕”背后作

①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92页。

出决策时,他们所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就是正义。这种人人都无知,因而都无偏见的状态,罗尔斯就管它叫“原始境况”。人们在无知之幕后原始境况下选择社会契约的原则和内容时,势必考虑到社会上各种人群的利益,必须对所有人都不偏不倚。当然,罗尔斯称之为“原始境况”,仅仅是他的主观愿望,事实上在现当代社会这种“原始境况”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复制”的。但是,罗尔斯有关公平的见解和论述,还是能体现他的真知灼见。另一位美国杰出的学者罗纳德·德沃金在他的《至上的美德》一书中提出了“福利平等、资源平等”。他认为,如果我们决心做到平等,却又从资源与它们所带来的福利无关这个角度来界定平等,那么我们似乎是错误地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如果我们真想把人们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我们就必须设法做到,使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同等地值得欲求,或给予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而不只是让他们的银行账号上有相同的数字。他主张利用市场机制(如拍卖、保险等手段)来解决平等问题,这体现在资源平等的两个要求之中:一方面,允许任何特定时刻的资源分配反映人们的抱负,反映人们所作选择给别人带来的成本或收益。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资源分配在任何时候对天赋过于敏感。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体现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对公平正义追求的一种欲望与诉求,但毕竟受到时代条件与社会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实现社会真正的公平正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充满等级观念的等级社会的历史,占支配地位的是等级秩序的思想,但同时劳动群众中“均平”的主张和要求也无处不在,从而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如陈胜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黄巢:“天补均平”。黄巢“均平”的提出,在农民起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王小波、李顺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这个口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对政治地位问题提出了目标,即“等贵贱”。还有李自成的“均田免粮”。李自成起义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均田免粮”的口号已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标志着当时农民起义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朴素的公平、平等思想,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1845年至1846年,洪秀全在广东家中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诗文,提出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公平正直之世”。这个“公平正直之世”,体现着政治、经济、男女和国与国的平等。他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应该是兄弟般的平等关系。天下从来就是一家,应为人人共有,君王无权私有独占。他

指出世间的“服食器用”都是上帝造成,应该人人共同享受,反对存在着“此疆彼界之私”和“尔吞我并之念”。他认为男女都是兄弟姐妹的平等关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应该共同反对“邪魔”的压迫,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他主张“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①。洪秀全的朴素公平、平等思想产生的社会物质根源,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是农民阶级“革命本能的简单表现”。^②它是我国唐末以来农民战争中出现的平等平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利用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中“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思想材料,并给予新的解释。它的特点是以神学异端出现,用宗教外衣掩盖农民民主主义的内核。它代表了鸦片战争后,在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下,极端贫困和无权的中国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放的呼声。它一经产生,便对发动千百万贫苦农民起来革命起着巨大的作用。“拜上帝会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速及于广西数县地方”。^③洪秀全的朴素公平、平等思想又是和皇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农民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愿望,是农民阶级的本质和主流,要求公平也是农民阶级的本能。但农民阶级又是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小私有者,它易于接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皇权主义本是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封建意识形态,皇帝受命于天,至高无上,是当然的统治者。农民受帝王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真命天子出现,才能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他们反对直接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但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存在着幻想,认为好皇帝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某些封建帝王曾实行过“轻徭薄赋”,更助长了这种幻想。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④

孙中山先生是具有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革命思想家。他继承了中华民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纯朴原始公平、平等思想,他具有中国人传统道德观念的“天听民视”、“民胞物与”的爱民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农民平均主义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5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57—858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6页。

思想；中庸之道的观点，主张阶级调和，故临终仍不断呼吁：“和平，奋斗，救中国！”……这些思想浸透在他的全部著作与讲演中。他在中国文化固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民主、人道等观点，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由于他是忠诚的民主主义战士，具有伟大革命襟怀，一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俄国革命的实践，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自然地很容易升华成追求理想社会的革命家，不幸的是他过早地与世长辞了。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较完整地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表述出来。宣言指出：（1）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由政府进行土地管理及征税事宜；（2）私地由地主报价，国家就价征税，必要时依价收买；（3）国家当给佃农以土地，资其耕种……。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在国内看到农村的破产萧条、土地荒芜，主张“地尽其利”；另一方面是看到西方都市地价猛涨，少数地主坐享其成，主张“共未来的产”。他先注意城市土地问题，而后注重农村土地问题——提出“耕者有其田”，从而达到国家控制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人人平等使用。

应该看到，我国从古代到近代，人们在思考社会公平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平均主义倾向。平均主义产生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平均主义者试图用小型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的标准来改造世界，幻想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平均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进而要求消灭一切差别，在各方面实现绝对平均。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农民要求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建立一个有饭同吃、有地同耕的理想社会，从摧毁和瓦解封建所有制角度来说，平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

平均与公平毕竟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平均主义抹杀劳动报酬上的任何差别，把社会化大生产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它否认以劳动作为分配的根本尺度，否认劳动者在劳动复杂程度、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劳动报酬的差别。平均主义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力求上进的精神。涣散劳动者队伍，腐蚀劳动者的思想，不利于劳动者的团结。助长人们的懒惰思想，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不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的平均主义不仅反映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社会公平、平等理念的认识不足，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公平道德诉求的历史局限性。

三

在人类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中最基本的社会诉求,就是摆脱社会中的各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实现一种公平、正义、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和谐社会,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飞跃,以及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都是在这些基本的价值目标与追求中去为之奋斗。而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那时起,她的原始定义中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当年那些跟随共产党扛枪闹革命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境界,但每个人都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基本理想,他们正是依托这一理想前仆后继,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落后的,腐败的,不公平的,不平等的旧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使全国人民过上没有剥削、压迫的和公平、平等的幸福生活。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毛泽东等前辈领导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正确理解与追求,以致不仅搞“人民公社”这种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同时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方面,基本上是平均主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我党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中存在平均主义思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做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目前,在社会乃至学术界对这一命题有一点非议,并把我国目前颇多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与这一命题联系起来。这种非议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打破了我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的平均主义,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中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刚刚开始,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因素只是初露端倪,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恰恰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合理性,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人们冲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确立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冲破和消解平均主